

北大学术讲演丛书·17·

汤用彤学术讲座之三

中国文化基因库

〔法〕施舟人 讲演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文化基因库/施舟人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8

(北大讲演丛书;17)

ISBN 7-301-05808-X

I. 中… II. 施… III. 文化—研究—中国

IV. C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52674 号

书 名: 中国文化基因库

著作责任者: [法]施舟人

责任编辑: 王立刚

标准书号: ISBN 7-301-05808-X/B·0239

出版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网址: www.pup.com.cn 电子信箱: zpup@pup.pku.edu.cn

电话: 发行部 62754140 出版部 62752015 编辑部 62752025

排版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印刷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销者: 新华书店

787mm×1092mm 32 开本 5.625印张 133 千字

2002 年 8 月第 1 版 200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0.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目 录

序	汤一介 (1)
自序	(5)
文化基因库——关于文史学的作用与前景	(9)
老台南的土地公会	(29)
滑稽神	(57)
仙人唐公房	(70)
《道藏》中的民间信仰资料	(84)
《老子中经》初探	(101)
道与吾	(117)
李渤及其《真系传》	(124)
第一洞天：闽东宁德霍童山初考	(133)
道教在近代中国的变迁	(146)
施舟人道教研究论著选目	(163)

编者前言

“汤用彤学术讲座”是由北京大学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联合中国文化书院、北京国林风图书中心为纪念汤用彤先生对现代中国学术所做的贡献而设立的。该讲座自1997年开始设立,每年请一两位国内外的著名学者担任主讲。每位主讲的演讲辞和他们的其他相关论文编辑成论文集,作为“北大学术讲演丛书”,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汤用彤先生(1893—1964)早年留学美国,获哈佛大学硕士学位。1922年回国后,历任东南大学、南开大学、中央大学、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系主任、文学院院长等职。1947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评议员。1949年后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1951年后一直任北京大学副校长,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

汤用彤先生是现代中国学术史上少数几位能会通中西、接通华梵、熔铸古今的学术大师之一。由于他精通内外经典,又接受过严格的西方哲学、语言和治学方法的训练,而且又有严格求实的治学态度,对人类古代文明能持“同情”而又客观的研究态度,他的一些学术著作如《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印度哲学史略》、《魏晋玄学论稿》等在出版几十年后仍然是国内外学术界公认的权威性著作,这使他在国内外学术界享有崇高的学术地位。

序

中国文化书院和北京大学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于1997年设立《汤用彤学术讲座》，每年5月邀请国内外学者作为该讲座的主讲教授。1998年有幸邀请到荷兰科学院院士、法国高等研究院教授施舟人来北京作第二届“汤用彤学术讲座”的主讲教授。收在本文集中的《道教在中国近代的变迁》就是施教授的讲演全文。

我和施舟人教授认识多年，我们都对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道教有着相同的兴趣，从而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施舟人教授不仅是一位知识广博的学者，而且在他所研究的范围可以说是有着独创性的学者。他在道教的研究方面无疑是当代最杰出的专家之一。我们从这部《中国文化基因库》可以看出，施舟人教授在文化理论、宗教理论，道教文献、道教历史和道教信仰种种方面都具有独到见解。我不得不提到施教授花了近二十年的时间把《道藏》大部分编成索引输入电脑，这大大有助于道教的研究。特别是在此基础上又完成了《道教通考》（将由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于2002年出版）。《道教通考》的出版将会为道教的研究开启一个新的划时代的阶段，我们期待着能早日见到这部大书。

本书的第一篇《文化基因库——关于文史学的作用与

前景》是一篇有关文化理论和论述当前文化发展前景的重要论文。施教授指出：“新的文化形式出现，总是不同文化传统相互使用的结果，总是不同文明互动的产物。”这个论断十分准确地概括了文化发展的总趋势。在当前经济全球化、科技一体化、信息网络的迅猛发展，把世界联成一片，因而各种文化将更不可能各自独立地发展，而是在相互影响下形成的文化多元共存的局面，各种文化将由其吸收他种文化的某些因素和更新自身文化的能力决定其对人类文化合理、健康发展的大小。在这种形势下，跨文化与跨学科研究将会成为 21 世纪文化发展的动力。幅地世界联成一片，每种文化都不可能孤立地发展，“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如果从另外一种文化系统看，也许会更全面地认识这种文化的特点。以“互为主观”、“互相参照”为核心，重视从“他者”反照自身文化逐渐为广大中外学者所接受，并为文化的多元发展奠定了基础。在各个学科之间同样也有这样的问题。今日科学已大大不同于西方十七八世纪那个时候的情况了。当前科学已打破原来分科的状况，发展出来许多新兴学科、边缘学科，原来学科的划分越来越模糊，本来物理学就是物理学，化学就是化学，现在既有物理化学，又有化学物理学。不仅如此，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界限也正在被打破。因此，就目前情况看，在不同文化传统和不同学科之间正在形成一种互相渗透的情况。在这种科学和文化日新月异的情况下，我们如何保卫人类文化遗产？也就是说，我们如何保护施教授所说的“文史学”，已成为当务之急。施教授提到，“今天，文化多样性受到全球一体化的威胁”，然

而“文史学构成了人类文化的宝库”，因为“文史专业保存和传播古老知识的功能，如果不比建立新的研究模式，寻求新见解更为重要的话，至少同等重要”。施教授的这个看法是深有远见的。人类的物质和精神的文化遗产被毁灭了，就没有可能再重建。北京的千所的庙宇消失殆尽，我们失去的不仅仅是这些古老的建筑物，而同时也就失去了一种文化精神。现在，我们中国许多地方建筑了一批假古董，无论它如何富丽堂皇，涂金抹银，可它没有内在的文化内涵，不可能唤起人们的历史感，对文史学者来说是毫无研究价值的。“让我们来捍卫我们的老牌学科吧，没有什么比我们的文史专业能更好地保存和传授古老知识。”人类不能没有文化，不能没有历史。各个有长久历史的民族要靠他们创造的古老文化来参与当今的各种交流，这样才能使在交流中发挥其自身的价值。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 1883—1969)曾提出“轴心时代”的观念。他认为，在公元前五六百年前后，在古希腊、以色列、印度、中国几乎同时出现了伟大的思想家，他们都对人类关切的根本问题提出了独到的看法，并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传统。他说：“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燃起新的火焰。”(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译本第14页，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今天，在频繁的文化交流和碰撞中，一个民族要想使其文化得到延续，就不能不回顾其古老的文化传统，而文史知识正是古老文化的基因库，文史学者无疑则是这古老文化传统的承担者。

我注意到施教授把他这本书名定为《中国文化基因

库》，对此我有一个猜想，施教授的这部论文集可以说涉及中国文史的诸多方面：它包括到中国的民俗、道家哲学、儒家思想、经典考订、历史地理等等，可以说用一些个案的典型分析而显示中国文化基因库的意义。如果进一步分析，也许施教授的意思是“道教文化”是中国文化的基因库，或者说《道藏》这部大书是“中国文化基因库”。我希望我的猜测能为施教授所承认。我没能像施教授那样把《道藏》认真研究过，只是零零星星地读了一些，但是我深信这部大书是中国文化的“根柢”，也就是施教授所说“无用之用”的中国文史学，是中国文化的基因库。

当我写到这里时，突然电话铃响了，我的朋友孙长江教授来电话，告诉我美国发生了大事，纽约的两座贸易大厦被炸了，让我快看电视。我忙打开电视，只见大火和浓烟笼罩着曼哈顿。这真是骇人听闻。这也使我想到，科学虽可造福人类社会，但也可危害人类社会。看来，人类社会还是不能缺少“无用之用”的文史学。让我们共同来保护“文化基因库”吧！

汤一介

2001年9月11日夜

自序

我出生于北欧，家庭世代为基督教徒，父母俩人都是牧师。十四岁时，我们家搬到阿姆斯特丹，我在那里完成了中学学业。当时，荷兰传统的“大学预科班”还专门教古拉丁文和希腊语，其他科目包含欧洲各种语言（德语、法语、英语等）、历史地理和一点数学，没有任何关于中国的知识。1952年，在荷兰国立博物馆偶然有一个“远东美术展览”，规模不大，内容包括各个时代的中国和日本艺术品。那时十八岁的我十分兴奋，每天都去看，对中国的青铜器和山水画印象特别深刻。

中学毕业后，由于在荷兰无法学中国美术史，我就去了法国巴黎罗浮宫博物馆艺术学校读书，同时也学中文和日文。几年之后，我慢慢开始想了解中国美术的起源，因此进入巴黎大学和法兰西学院读中国思想史，其中也有康德谟先生的道家与道教思想课。我好多年听康先生的课，在大部分时间里我是他惟一的学生。康先生和我一起念从前很少有人课堂上用过的书，如《老子想尔注》、《太上灵宝五符序》以及《灵宝无量度人妙经》等。那时，我很喜欢看《道藏经》，从陈国符先生的《道藏源流考》那里了解了“上清经”。我的博士论文就是对上清经的初步研究。

感谢著名的佛教学者戴密微先生的帮助，1962年秋天

大学的《人文学刊》(香港,2001)分别发表过中、英文版。

(2)《老台南的土地公会》,原作发表于施坚雅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英文版,斯坦福,1977;中文版,中华书局,2000)。后来也收入《法国汉学》第三辑(北京,1998)。这次我们对文章的最后部分做了较大的改写。

(3)《滑稽神》的英文稿发表于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所学刊(台北,1966),《民俗曲艺》发表了中文版(台北,1983)。

(4)《仙人唐公房》,原为法文,发表于1991年。中文亦曾收入傅飞岚主编的《圣迹崇拜与圣者崇拜》(台北,2000)。

(5)《道藏中的民间资料》发表于《汉学研究通讯》(台北,1993)。

(6)《老子中经初探》见《道家文化研究》(北京,1998)。

(7)《道与吾》见《道家文化研究》(北京,1999)。

(8)《李渤及其真系传》发表于《韩愈研究论文集》(广东,1988)。

上述文章有的曾被多次转载,有的不止一次被翻成中文。鉴于一些译者无法获得原始引文,加上专业之间的隔膜,部分译文不尽如人意,所以这次我们重译了那部分文章。由于读者对象的改变,也因为其中几篇文章是我二三十年前撰写的,不谦虚地说,都是该领域的开山之作。虽然对许多西方学者的研究,有过不小的启发和影响,但毕竟属于个人之“少作”。尤其是最近十多年道教研究的发展,及我本人在完成《道藏通考》(将由美国芝加哥大学出

版社于 2002 年出版)后的今天,对一些问题难免有更进一步的认识。因此,对本论文集集中的一些文章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写。

归结来说,我是从传统的基督教文明走进中国文化圈的少数幸运的西方学者之一。是古老而富有生命力的中国文化,为我们提供了认识人类自身的新途径。道教所保存的十分丰富的文化传统,就是一个对人类文明贡献极大的中国文化基因库。

文化基因库

——关于文史学的作用与前景

本文的标题看起来像是企图借用科学术语来维护文史专业不断衰落的声望。不过,我想说明这种联想并不真切,“基因”一词在这里与其说是一个时髦的术语,毋宁说是一种概念。

首先要声明的一点是,我无意在此探讨基因与文化之间任何假定的直接关系或基因的“改良”问题,我并不相信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这种关系的存在。20 世纪的历史已告诉我们潜伏于那种不科学的拼凑和无根据的推测的危险,而这种拼凑和臆测曾被种族主义者所利用。

与此相反,我认为无论何时,新的文化形式出现,总是不同文化传统相互使用的结果,总是不同文明互动的产物。它们得自文明的交流和混合,有时也是不同来源的成分的杂交。事实证明,文化发展、传播和多样化的模式具有与生物进化相似的特征。另一个令人信服的事实是,在

基因谱系和语言进化谱系之间有着很大的关系。^①与此密切相关的还有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交叉受精和繁殖通常会产生更加强壮的样本，而“纯粹”血统的种类却会在漫长的过程中衰退。因此，保持变异的最大可能是一个物种未来的保障，而某一物种过于强大的主导力量则预示着它的厄运。

一、文化

人类学者将“文化”视为人类知识、信仰和行止融合而成的范式，因此在最普遍意义上，它涵盖了语言、理念、信仰、习俗、机制和科学。文化的发展主要依赖于人类学习并将知识传输给后代的能力。我们称之为“文史学”的人类知识类型，则关注于保存和传承不同知识种类的积累（口头或书面形式）。在今天所谓的科学时代，这种知识的积累往往被认为毫无用处。正如《庄子》所说的那株古老的大树，对于一般人来说，它可以观赏却毫无使用价值。^②今天，大学文史专业的学生在完成若干年的基础培训后，很难谋到与他们所受教育相当的职位。

^① 参见 Caralli-Sforza, *Cultural Transmission and Evolution: a Quantitative Approach*,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1; *The History and Geography of Human Gene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② 见《庄子·逍遥游》“惠子谓庄子曰：‘吾有大树，人谓之樗，其大本拥肿而不中绳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规矩，立之涂，匠者不顾。今子之言，大而无用，众所同去也。’庄子曰：‘……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出现了众多由文化人类学者发明的有关文化发展、文化相对主义和文化普泛性的理论,早些时候则有赫尔德、卢梭等人的文化进化论,以及 19 世纪晚期在达尔文主义影响下的泰勒的进化理论。上述各类理论大多建立在对所谓原始社会的研究的基础上,而绝少提到文化交流及其相互影响的作用。这种文化发展的作用,在我看来却非常重要,在文史和艺术领域尤其如此。

关于这种具有造化力的交流结果的例子俯拾皆是,如非洲音乐对当代流行音乐的影响,日本版面对梵高艺术创作的影响,非洲雕塑对毕加索绘画的影响,以及更普遍的日本建筑对西方现代建筑风格的影响。凭借上述有限的例子,就足以证明现代文明如何得益于那些迄今存世的各类文化。这样来看,各种不同的文化构成各具特色的种类仓库,由此构成灵感和创造的宝库。只要这些各具特色的种类存在,文化创新和复兴就有可能。从这个角度看,人类文化的功能无异于基因库的使用。基因库就是一个收藏和研究各种植物的原始资料机构,为了避免因基因逐渐衰退而造成的危机,为将来的杂交配种提供必要的物种。

在这里,我将探索具有全球性意义的文化基因库如何运作。它在过去意味着什么,在目前有何功能,对未来又有何益处。我会举一些西欧、近东和远东地区的例子,希望这些例子能够揭示文史学科的现状,并说明它无以置疑的重要性及其所面临的日渐衰微的危机。

二、近代科学的到来

如果对文化与科学之间的关系还有任何疑义,不妨回顾

一下“近代科学”的起源与发展。在这一过程中,文化交流的重要性远远超过我们通常所认识到的。不过,这并不妨碍许多高明的学者大胆地声称,真正的科学直接源于古希腊。在他们眼里,“真正的科学”也就等同于“西方科学”。

出于这种民族优越感,法国哲学家瑞南(Ernest Renan) 1883年在索邦大学(Sorbonne)发表了他称之为“欧洲科学”起源的演讲。他在谈阿拉伯人对数学的贡献时说:“在所有这一切中,惟一真正有生命力的因素是古希腊文化。古希腊文化是知识和正确思维的惟一源泉。”其后,法兰西科学院院士赛瑞斯(Michel Serres)在一本科学史上十分重要的著作(却只字未提印度和中国)中写道:

在不到4个世纪的时间里,从米利都的泰勒斯(Thales of Milet)到亚历山大的欧几里德……希腊哲学家们以一种惊人和出乎意料的方式,共同缔造了这个无形而又无与伦比的帝国,它不朽的辉煌一直延续至今。人类曾有过其他可与之媲美的体系吗?这一成就就是数学。

稍后我们再以一种比较客观的方式来讨论这个因数学而被认为是神圣的人类体系及其优点。首先要说的是,瑞南和赛瑞斯认为西方近代科学是古希腊人的嫡系后裔这一观点完全错误。正如胡弗(Toby E. Huff)在他有关近代科学兴起的新作中指出的,古希腊的科学遗产原来已经被西方世界遗失了若干世纪。事实上,在5世纪罗马帝国终结到十二三世纪的翻译热潮之间的七百多年中,希腊科

学在欧洲已不复存在。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尤其从第8世纪开始,阿拉伯的科学在诸多方面具有世界领先地位,既大大超过西方,也将中国甩在后头。在天文学、数学、光学以及其他几乎可以说是各个科学领域,阿拉伯科学家们^①居于科学进步的前沿。^②正是他们不仅继承、传授了古希腊人的科学,并且进行了很大的补充和改进。

众所周知,亚力山大的欧几里德《几何原理》一书,尤其是其中有关几何的部分,对近代科学的发展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它们在许多方面构成了西方数学的基础。《几何原理》创作于公元前4世纪,流传下来的惟一可称得上完整的版本是写于公元第4世纪下半叶的亚历山大的赛昂(Theon of Alexandria)本。直到16世纪,西方人才有机会见到这一版本!

然而,阿拉伯人早就开始了解欧几里德,他们从一位拜占庭国王那里得到一份抄本。《几何原理》的第一个译本发表于拉什德(Harun Al-Rashid, 786—883)时代的巴格达。此后,所有在欧洲流传的欧几里德译本都出自阿拉伯人之手。欧洲第一个完整的拉丁文译本是康帕纳斯(Johannes Campanus)完成于1260年。西方人不仅从阿拉伯人那里获得了这部书,而且还获得了活生生的数学传统。在西方,尽管欧几里德其他一些次要的作品也流传下来,但并未引发任何新的科学发展。真正的科学复兴与十二三世

① 这里主要指以使用阿拉伯语为主的中东人,包括阿拉伯人、伊朗人、基督徒和犹太人。

② Huff, *The Rise of Early Modern Science—Islam, China and the Wes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48.